

SHENG XIANG DE XIU CI



圣像的修辞

+

耶稣基督形象

在明清民间社会的变迁

褚潇白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HENG XIANG DE XIU CI

■ 褚潇白 / 著



圣像的修辞

+

耶稣基督形象
在明清民间社会的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像的修辞：耶稣基督形象在明清民间社会的变迁 / 褚潇白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004-9555-0

I. ①圣… II. ①褚… III. ①基督教史—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6635 号

特约编辑 李登贵等
责任编辑 陈彪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张建军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9.5 插页 2

字数 32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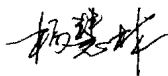
定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

献给我亲爱的超级外婆：沈洁女士

读褚潇白《圣像的修辞》



如果说圣像之“圣”表达了描摹者的想象和期待，那么圣像之“像”则暗示着符号的巨大张力和理解空间。因此圣像的确是一种修辞：“圣”与“像”的相生互动，才使“象征的力量”得以成全^①；而文化符号的“植入”与“生成”，又恰恰是圣像之“修辞”的典型模式。这不仅可以从基督教在西方的演化中得到解说，而且与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有着特别的联系。或者反过来说，基督教的圣像不仅在中国呈现为一种外来符号“植入”与本土符号“生成”的过程，甚至在西方也同样如此。这一背景，可能借《圣像的修辞》显示出更具普遍性的意义结构。

曾有西方学者坦率地提出：“神学话语不是自足的、与其所参与的文化相互隔绝的文化生产，而是一种寄生性的文化生产（a kind of parasitic cultural production）”。^②所谓“寄生性的文化生产”，正是借助于文化符号的“植入”与“生成”；而无论文字还是图像，欧洲原有的神话传统恰好为基督教提供了可以“寄生”之处。

比如“圣杯”传奇是从凯尔特神话的亚瑟王故事中引申出来，本与基督教没有多少关联，但是在欧洲中世纪被演绎为圣杯中盛着耶稣的宝血、只有像耶稣一样品行端正的骑士才能找到圣杯等等。因此就连在《圣经》的记载中埋葬耶稣的财主约瑟（太 27：57 - 60），最终也进入了一些“圣杯”故事的文本；而由于与圭尼维尔发生了私情，亚瑟王故事中的重要人

① 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Vincent J. Miller, *Consuming Religion: Christian Faith and Practice in a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4, p. 173.

物兰斯洛特很难再代表基督教的理想,于是在后来的“圣杯”传奇中不能被高文、帕齐法尔所取代。^①《特利斯丹和绮瑟》以及诸多的骑士叙事诗、抒情诗甚至民谣,也都可以考查出类似的“微调”或者“改写”过程。乃至当骑士的业绩、爱情和道德成为普遍的文学主题时,其原型已经不是古老的“异教”英雄,却是欧洲化了的基督教圣徒。

这一“寄生”的最直观结果,当属中世纪欧洲的教堂建筑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艺术创造。其基本符号同样是基督教与异教信仰的相互结合:象征着太阳崇拜和灵魂不朽的方尖碑,最终成为基督教教堂的古罗马万神殿等等。在圣彼得大教堂地下的教宗尤利乌斯一世(Pope Julius I, 337 - 352)墓穴拱顶,还有一幅马赛克装饰画,画面上的耶稣被表现为太阳神的形象,并且有阿波罗的战车相随,前景的葡萄藤则是酒神节的象征。^②

基督教对欧洲原有神话元素的吸纳和重述,一方面当然印证了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根本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神话的自身传统其实也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基督教的叙述体系,甚至改变它的构成。换言之,后世的文化符号在接纳基督教观念的同时,也以世俗经验规范着基督教的叙述,使基督教本身打上某种世俗文化的烙印。从而这一过程既是欧洲的“基督教化”,也是基督教的“欧洲化”。

基督教进入中国以及“圣像”在中国的流变,是否也可能作如是追索呢?《圣像的修辞》所展示的,正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微调”与“改写”:从圣母和小儿到成年的耶稣,又到以十字架为背景的耶稣基督,最终则是种种更具本土色彩的描摹。其中的逻辑,似乎是从适应转向更多的挑战,而中国本土的符号传统实际上又从未淡出,却是在“被挑战”的同时也成为一种挑战。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圣像”相当典型地集合了相反而相成的“修辞”力量。即使在描绘圣母与小儿的“适应”阶段,一方面当然会唤起“皇太后与小皇帝”的联想;另一方面,“中国马利亚”^③也早已同西方的种种圣母像一样,成为基督教图像中的经典。

① Andrea M. L. Williams, *The Adventures of the Holy Grail, A Study of La Queste del Saint Graal*, Bern: Peter Lang AG, European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② 关于酒神、日神和基督何以融入同一种符号,可参阅吉尔·德勒兹著、周颖等译《尼采与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7页。

③ “中国马利亚”绘画藏于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北堂,画面上的圣母与圣子身着皇袍,俨然皇太后与小皇帝。

由此而论，外来文化符号未必能“唤起回忆”，却完全可能“进入记忆”，亦即从“植入”进而“生成”为本土文化的新符号。因为这种“生成”不仅包括接受性的“微调”，也包括反基督教漫画中的妖魔化，以及太平天国对基督教的“转化”。而“任何语言符号总是从别的语言符号之中生长出来的”^①，无论圣化、转化、妖魔化还是本土化，都从不同侧面参与了“衍指符号”（super-sign）的构成。

更为重要的是，“衍指符号”所衍生出的“语言变异”（linguistic monstrosity），在圣像的线索中又与“基督的变异”（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浑然一体^②。当代神学与人文学术在这一问题上的交叉和争论，当从《圣像的修辞》中得到特别的启发。

作为一位年轻学者，褚潇白已经打开了一片诱人的天地；作为一支醒目的路标，《圣像的修辞》也许会引领更多的学人接受挑战、也发出挑战。

2011年3月18日读后

① 相关讨论请参阅刘禾著、杨立华等译《帝国的话语政治》，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4页，第10-14页。

② Creston Davis edited, *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 Paradox or Dialectic?*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9.

序

郑元者

潇白 2000 年以复旦大学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的资格考取我的研究生，攻读文艺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论拜占庭圣像画中的基督形象》在 2003 年 6 月初举行的答辩会上获评委们的一致好评。2006 年 9 月，潇白以格外优异的成绩考取我的博士研究生，攻读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在长达十余年的交往中，潇白在为人上的真挚、感恩，在为学上的知性、聪慧和锐意进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她是一位胸怀心灯和神灯、笃定在求知问道中寻觅无上喜乐的有志青年。如今，她把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耶稣基督形象在明清民间社会的变迁》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扩充，成为一本学术专著，其间的辛劳和喜乐不言而喻。

有关耶稣基督形象在世界各地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族群文化中的变迁问题，历来是一个具有极高难度的研究课题。虽然早在 1 世纪末基督教已传播到罗马最边远的地区，但从基督教的兴起至今，其跨大洲、跨文化的传播遭遇了各色抵制和阻止的举措，无论是亚洲、非洲与早期基督教世界的关系，还是基督教移植拉丁美洲的复杂历程，均有这方面的丰富事例，而这些举措本身蕴含着无尽的信仰故事和精神期待。如何在学理上考究这些信仰故事和精神期待背后所演绎的文化接触、文化碰撞、文化变迁乃至信仰同化问题，自然是一个既棘手又富挑战性的高端问题领域。潇白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最初几经更改，但最终以“耶稣基督形象在明清民间社会的变迁”为题切入，我认为是经过严肃推敲、优化考量的，因而亦寄予厚望。历经三年的高强度作业，她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对明清时期基督教绘画艺术中的耶稣基督形象之变迁作出了系统、全面的考察，既正面

触及并揭示了耶稣基督这个“符号”在明清社会历史演进中所蕴含的记忆形式和救赎的空间形态，又在总体性上展示了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情境下的本土性意识之间的内在张力和转化过程，有鲜明的学术创新性和较强的学理说服力，在该研究领域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学术探索，为中西文化艺术接触尤其是宗教艺术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内涵变化、意义调适、符号寓意的复杂表现以及接受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创意的求解案例。萧白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在决议书中认为该成果“把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融会贯通，细腻地揭示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民间文化相遇交汇中的对抗、调整、融合与反思的复杂机理，具有较大的学术突破”，这个评价应该说是相当高的，其中可能有评委们奖掖后学的鼓励之意。当然，依我个人之见，倘若将萧白对该论题的解读方式推敲起来，有一些关键问题恐怕值得进一步思考，比如，把研究对象“耶稣基督形象”作为一种“符号”固然是一个有学术效力的研究策略和分析走向，做好了甚至有望推展成一种解读程式，但耶稣基督形象的内涵毕竟有不可表征的一面，其内涵的变迁亦非各种符号形式所能完全承载，如能兼顾到耶稣基督形象在明清民间社会的变迁过程中未被表征和不可表征的一面，在论题的学理基点上自然会更加精审一些；又如，除了在学理上把耶稣基督形象处理为一种符号形式以外，要是进一步把耶稣基督形象在明清民间社会的变迁定位成一种独特的符号文明的变迁，注重开掘信仰行为本身与明清民间社会特定的文化、历史观念之间的张力，是否可以在另一维度上更加鲜活地审察耶稣基督形象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律动？好在萧白在该研究论题上的学术兴趣和价值认知是长期的、开放的，不断的认知、不断的探索和不断的实验，相信会成为她学术新生的底色。

“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四库提要·集部总叙》）在萧白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出版之际，希望她远离喧嚣，秉承“一个世界或没有世界”的理念，以最高的理智谦虚和精神能力来激活学术生命的可能性，塑造自己的成长经典。

2011年2月3日

于复旦大学光华楼工作室

致 谢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成书过程中得到许多人的帮助，特此致谢。

首先感谢导师郑元者先生。郑老师为学生投注大量心血，且以严厉闻名：仅此文预开题就前后进行了五次，被“枪毙”过四次，直到今天最后交稿，还是诚惶诚恐，惟恐对不住老师的付出。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基督宗教教学资源中心和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多次提供研习机会，特别感谢江丕盛、杨庆球、温伟耀、叶敬德、关启文和雷竞业等教授的悉心指导。

感谢北京问道论坛的老师 and 朋友们。我两次受邀前往论坛主讲此书中的相关章节，得到热烈回应。大家的提问、批评和探讨成为我继续写作的起点。特别感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王东成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孙毅老师和人类学系黄剑波老师给予我来自不同学科的相关指导和帮助。

感谢北京大学地空学院的成功博士。本书虽为历史性书写，未曾涉及具体的田野工作，但其中“让与观察”的方法却一以贯之，而此方法在实践中成为我的真知则获益于成功博士的引领。希望的田野不仅在云岭之南，在关塞之东，也在每一次阅读，每一回分享，每一段聆听和书写之中。

感谢香港浸会大学哲学系的韩思艺博士，书中的许多海外资料都有赖韩博士为我印寄；感谢师兄张常勇博士，本书进入最后阶段时，我遭遇眼疾，后期格式调整、图片修订和参考文献整理等大量繁复琐碎的工作都仰赖他熬夜为我赶制；感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杨焄老师为我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指出初稿中一些令我无比汗颜的“硬伤”，比如我将胡适参加夏威夷会议的时间误写作1949年，而实际应为1959年。

感谢北京《佛教文化》主编桑吉扎西老师、上海佘山修院方补课神父和上海基督教全国两会研究部田文载先生。他们为我提供了本书写作中不可或缺的资料和诸多信息，我也从他们身上亲见了信仰与学术完美结合后的动人光彩。

感谢上海的两位自由职业者：剧作家姜原来先生和画家王鲁先生。我从他们身上看见自由的绚丽及为自由所须付出的代价，这样一个“看见”伴随着他们珍贵的信仰，一起被写入本书。

感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的夏术阶主任和张捷医生，没有他们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我不可能重回校园继续学业和研究；感谢美国库克大学校长黄天中先生，在我的人生陷入低谷的时候，他特地从美国“空降”到医院，为我带来弥足珍贵的安慰和激励。感谢我的亲人张黎女士、林顺阵先生、胡云珍女士、顾克珍女士，张戈先生和余铮女士，他们是我人生道路上不离不弃的支持者。

感谢所有善良而坚定信仰的人们，我盼望自己能将他们炽热的激情和恒久的深情写入今后的每篇文章。他们中还有我亲爱的外婆和父母。

最后，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和复旦大学郑元者教授在百忙中为我作序，也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彪先生为此书出版付出的心血。

.....

虽然此作有太多不足之处，仍愿它如馨香之祭，得蒙悦纳。

褚潇白

初稿于2009年4月复旦北区“火焰山”

修订于2011年3月牛津 Summer Town

目 录

读褚潇白《圣像的修辞》	杨慧林 (1)
序	郑元者 (4)
致谢	褚潇白 (1)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素材	(8)
第一章 明末至清中叶基督教艺术中的耶稣基督形象	(20)
第一节 耶稣基督画像的展现及反应	(22)
一 基督宗教画像的流布方式	(25)
二 反应	(30)
第二节 从祈福标记到宗教符号	(35)
一 无名者耶稣基督	(35)
二 《程氏墨苑》的成年基督	(38)
第三节 符号的意义扭结与呈现	(44)
一 十字架与救赎	(44)
二 《诵念珠规程》与《天主降生出像经解》中的十字架耶稣	(48)
第四节 符号表现形式的微调	(52)
第二章 内地会传教画的耶稣基督形象	(59)
第一节 耶稣基督形象制作者	(60)
第二节 寓言叙事的中心与边缘	(65)
第三节 寓言叙事中的救赎母题	(70)

第三章 太平天国运动的耶稣基督形象	(80)
第一节 天兄耶稣之所指	(84)
一 奇梦叙述中的天兄耶稣	(84)
二 拜上帝教的神功崇拜	(88)
第二节 天兄耶稣之谱系	(96)
一 家族伦理与人间基督	(97)
二 差遣的单数形式	(100)
三 差遣的复数形式	(102)
第三节 天兄耶稣之经世	(106)
一 差遣的经世特征:代赎	(106)
二 差遣之空间性分析视野中的耶稣基督形象	(108)
三 差遣之时间性分析视野中的耶稣基督形象	(116)
第四章 19 世纪反教漫画中的耶稣基督形象	(120)
第一节 民俗性符号的二元结构	(121)
一 乡绅群体话语的符号学分析	(121)
二 反教画中符号的身份分析	(126)
第二节 强化二元性符号结构的外在要素	(128)
一 耶稣符号的情绪分析	(128)
二 二元结构斥力之加深	(131)
第三节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耶稣基督形象(一)	(135)
一 “非基督徒/基督徒”和“人/兽”之二元对峙	(136)
二 猪作为符号的权力疆界分析	(142)
三 民间传言的符号方式	(145)
第四节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耶稣基督形象(二)	(151)
一 清末教案:非理性背后之理性	(151)
二 反教运动的知识论基础	(156)
第五节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耶稣基督形象(三)	(158)
第五章 《天路历程》中文版的耶稣基督形象	(164)
第一节 《天路历程》的民族志修辞学(一)	(168)

一 《天路历程》的民族志形式	(169)
二 《天路历程》不同版本的修辞学	(170)
第二节《天路历程》的民族志修辞学(二)	(175)
一 “门”的隐喻性转义	(175)
二 《天路历程》之章回体叙事	(176)
第三节 《天路历程》的民族志修辞学(三)	(179)
第四节 《天路历程》的本体性修辞学	(187)
第五节 《天路历程》的本土性修辞学	(195)
 第六章 土山湾画馆与耶稣基督形象	(207)
第一节 耶稣基督形象和美的深描	(210)
一 耶稣基督形象的深描	(211)
二 美的形式之情景相关分析	(216)
第二节 耶稣基督形象的空间形式重塑	(221)
第三节 耶稣基督形象的内在空间形式	(228)
第四节 耶稣基督形象的外在空间形式	(232)
一 耶稣基督形象与有位格的人	(232)
二 美的符号与记忆的治疗	(236)
 结论	(243)
第一节 耶稣基督形象的变形:本土性意识的多维呈现	(243)
一 主动方变形	(245)
二 接收方变形	(249)
第二节 代赎意识与自我救赎意识:变形过程中的张力	(254)
第三节 还原为本土性意识的本土化问题	(261)
 参考文献	(275)
 中英文摘要	(291)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

本书以符号人类学为主要方法,探讨明清图像中耶稣基督形象的呈现形态及其所显示的人类学意识。从晚明时期传入中国社会以来,^① 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本土性意识之间的张力就未曾消失过。明清基督教^②和反基督教绘画中耶稣基督形象的变迁形式,都是这种张力的结果。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还有反基督教的一方,都以各种形式转化耶稣基督形象。就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而言,他们的主要努力在于降低基督信仰与本土性意识的张力,而反基督教的一方则要充分显示基督信仰与本土性意识的张力。以往的研究文献已有不少涉及这个主题,然而主要是历史的、文献学的、艺术史的或者哲学的描述,^③ 就笔者所掌握的文献来看,还没有对明清基督教绘画艺术中的耶稣基督形象作符号人类学的分析。

① 广义的基督教之传入中国始于唐朝,其时名为“景教”,后于元朝再度兴盛一时,名为“也里可温”。本书对耶稣基督形象作明清断代史的分析,故不对唐、元时期传教情况进行论述。

② 本书所用“基督教”均指包含了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广义基督教。在本书具体写作中,并未涉及到东正教的个案。另外,在各章节中,基本指明具体研究对象所归属之天主教与新教之分。

③ 这些研究成果数量众多,现将其代表作列举一二如下——史学方面: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钟鸣旦、孙尚扬:《一八四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周萍萍:《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文献学方面:裴化行(H. Bernard):《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萧浚华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历史图片论文集》,宇宙光出版社1979年版。艺术史方面:莫小也:《17—18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哲学方面: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晚明基督论》,王志成、思竹、汪建达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版;刘小枫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本书依据符号人类学的分析方法,从以下三个方面呈现这个论域的主题:首先,各种图像中耶稣基督形象的符号形式;其次,实施耶稣基督形象各种不同形式进行符号微调所基于的人类学因素;最后,通过分析种种表现耶稣基督形象的方式,呈现明清时期这个中国社会大变动时代不同社会群体的人类学意识。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从图像艺术赋予形式的特殊性显示基督信仰与本土性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对图像艺术之赋予形式的文化要素,尤其是民俗文化形式涂抹在耶稣基督形象之上的意识形式作了专门细致的分析,以显示各种不同形态的耶稣基督的符号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修辞学含义。

第一章论述晚明时期天主教传入中国社会始初,基督教绘画艺术中的耶稣基督形象及其符号形式的微调。早期,传教士们以西洋技法,通过圣母与小儿耶稣基督形象及其所展示的人伦关系呈现基督信仰的本土性关联,论说儒家的人伦关系通过耶稣基督的位格形式能够得到更充分更完整的呈现。此后,传教士们通过中国化了的构图形式(包括由透视法向写意法的运用转变以及空间形式表现为中国式院落和仆人等象征)中的成年耶稣基督形象,显示基督信仰有着更广泛的符号意义,表达耶稣基督与中国历史空间的内在一致性。随后,传教士们又采用传统版画表现方式,以十字架为主体来呈现耶稣基督形象。在这种类型的图像观照中,耶稣基督位格的十字架特性被作为核心观念呈现为对本土性意识的挑战,进而显示唯有当以十字架为理解中国本土历史的符号所指时,历史描述才能够生长出救赎意识。本章以为,耶稣会传教士对基督教绘画艺术形式之符号微调进程的此种运用,包含着符号双向运动过程。一方面,就基督教艺术的表现形式来说,传教士们努力使绘画的空间造型适应中国人的视觉形式;另一方面,就耶稣基督形象与本土性意识的关系而言,传教士们越来越倾向于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形象挑战儒家的人伦意识,耶稣基督形象作为救赎历史的核心符号所指愈显突出。这种变化既表现出传教士们所理解的基督教人类学意识的变化,也表现出他们在考虑把耶稣基督形象植入本土文化过程中本土性意识的转化。传教士们非常清楚,绘画艺术作为一种感觉艺术,它本身就包含着意识形式。由此,传教士们通过重新解读中国历史,指出基于献祭的苦难意识是隐藏于中国历史文化之内的符号,陈明耶稣基督的历史救赎是面向中国人的救赎,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之救赎符号是中国历史本土性意识的构成要素。

第二章探讨清代内地会传教士的图像艺术所呈现的耶稣基督形象及其本土化形态。在基督教本土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的分别。所谓上行路线，就是传教士通过基督信仰和耶稣基督形象表达的精英化形式，通过从观念接近生活的策略，在作为生活形式的观念史层面建构基督信仰与本土性意识的内在一致性。所谓下行路线，则是指传教士们深入草根社会，向着边缘化状态下的社会群体，以一种地方性语言、地方性情感的认同方式表达一种信仰认同；表现在基督教图像艺术上，则是常以寓言性叙事的符号形式来显示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会传教士走的是上行路线，内地会采取的则是下行路线。这与两者活动区域和接触人群的差别有关。早期耶稣会传教士主要活动在中国大城市，传教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群体，^①内地会传教士则深入中国内地，生活和行走在草根阶层之中。对于这些底层的社会存在者来说，救赎不是观念上的说服以及精神的形式化呈现。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他们没有“精神”，这是指他们极少借助于观念形态的“精神”而言；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又极富“精神”，因为他们的精神就是日常生活中随时呈现的苦恼的受辱的情感形式，由此救赎是他们每天都面对的生活形式，而唯有面对救赎才真正地面对了“精神”，因为在这种生活形式的层面，日常生活呈现出苦难的真实形态，日常生活的存在形式就是苦难的形式。这种日常形式非常具体，包括诸如日用饮食的缺失，包括疾病的痛苦和没有出路的诉求，等等。对于草根社会来说，耶稣基督形象就是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秉持的勇气，救赎就是日常生活时刻要面对的盼望。内地会传教士深入草根阶层，用故事性叙事和寓言性符号来呈现一个充分表达了日常生活诉求之道的耶稣基督形象。通过对于生活的苦难进行重新表述的图像形式，显示耶稣基督形象所呈现的正是这种日常存在的勇气和盼望，从而表述其作为救赎的符号之于生活的直观形式。

内地会以走近生活直观的民俗形式和民俗叙事的故事方式显示耶稣基督形象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并使草根社会获得寻求救赎的出路，而太平天国运动则通过反叛的方式进一步实施日常生活、民俗的宗教形式和基督信

① 本书第一章主要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主要研究对象，耶稣会自身传教路线也常因人而异，特别是清中期礼仪之争基督教遭禁之后，留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只能秘密活动，服侍的群体也自然从知识阶层完全转向了贫苦大众。